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试论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谭　皓

内容提要　日本文部省虽自明治初年起便负责管理并对外派遣留学生，但在其后近30年间从未派遣学生来华留学。随着日本帝国大学中分科大学的设置、讲座制的引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文部省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师，自1899年起对华派遣留学生，从而开启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其中服部宇之吉便是名副其实的首位文部省留华学生。至1920年通过派遣留学生补充各新建大学师资的目的基本达成后，文部省又废止原有制度，代之以派遣"在外研究员"，但与前期变化不大。文部省留华学生虽起步较晚且人数有限，受重视程度不及留学欧美者，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但在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独特地位。

关键词　日本　文部省　留华学生　留学生派遣　留学史

近代日本文部省首次对华派遣留学生，可追溯至1899年来华留学的服部宇之吉。服部宇之吉也因其后来于1902—1909年担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①，以致学界基本沿用《续对支回顾录》的说法，称其"以留学生之名义来华指导中国教育界"②，将其留学生身份视为幌子。③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认识的偏差反映出学界对于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研究的不足。④ 本文依据日本教育史料及保存于日本外务省外

① 此外，纵观服部宇之吉一生，其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还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1909年后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以其对汉学特别是儒学的研究蜚声中日两国学界；二是此后至1925年又参与日本以庚款对华开展的"东方文化事业"，担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总裁，实为日方主要负责人。

② 東亜同文会編『続対支回顧録』下卷（明治百年史叢書第212卷）、原書房、1981年、744頁。

③ 如孙丽青的《服部宇之吉与近代中国教育》（《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一文将其留学生身份视为幌子，指其实为"结识北京的达官显贵，力图对中国的教育界施加一些影响"。

④ 关于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尚无专题研究，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也并未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梳理。一方面，石附実『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学史』（ミネルヴァ書房、1972年）、渡辺實『近代日本海外留学生史』（講談社、1977年）、辻直人『近代日本海外留学の目的変容——文部省留学生の派遣実態について』（東信堂、2010年）等关于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的研究，其视角多局限在日本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史，忽视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另一方面，即便对于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的专题研究，如桑兵《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也仅零散地提及部分留学生由文部省派遣的史实，对派遣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并未过多着墨。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等处的原始档案，梳理史料，考订史实，钩沉出一段鲜为人知的留学史。①

一、1899 年前日本文部省对外派遣留学生制度之沿革

日本早在 1871 年遣使来华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之际，就已开始对华派遣留学生，其后中央政府各部门亦出于各自目的派遣学生来华留学②，但在世纪之交的 1899 年前并无文部省的身影。究其原因，还要从文部省对外派遣留学生制度的沿革说起。

日本文部省成立于 1871 年 7 月 18 日，以统一国民精神及培养人才为职责③，成立后便接管与教育相关的一切事务，其中包括对外派遣留学生事宜。近代日本对外派遣留学生，最早可追溯至德川幕府末期。随着“黑船来航”后 1854 年被迫签订《神奈川条约》及 1858 年的“安政五国条约”，维持了 200 余年的锁国体制土崩瓦解，日本转而积极向欧美摄取先进文化，德川幕府及地方强藩向荷兰（1862 年）、俄国（1865 年）、英国（1866 年）及法国（1867 年）派遣了留学生。明治政府建立后，为宣示改弦易张，曾于明治元年（1868 年）召回全体留学生，随后重新选派赴欧美留学生。不过，由于缺乏公正有效的选拔机制及充分的准备，这一时期的日本留学生表现出重“量”轻“质”、留学前预备教育不足、留学选拔程序不公，生源偏重个别藩（县）等问题。④ 加之，明治政府初建，财政紧张，很多部门为派遣留学经费犯难。⑤

为整顿原有制度，文部省于 1872 年 8 月 3 日颁布《学制》，制定“海外留学”规范，并于 1875 年 5 月公布《文部省贷费留学生规则》，实施学生留学期满后须服从工作安排及偿还留学补助义务的“贷费留学生制度”。同年 7 月 18 日，文部省派遣鸠山和夫等 11 人，前往美、法、德三国留学，学习法学、化学、工学等，是为文部省“贷费制留学生”之始。⑥ 翌年 6 月，文部省又派出了第二批留学生 10 人，分别前往英法两国学习法学、化学、工学及物理学。⑦

1882 年 2 月，文部省改原有“贷费留学生规则”为《官费海外留学生规则》，由文部卿从 1877 年 4 月 12 日创立的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派出国留学，但毕业后仍须回国任职。1884 年 3 月又规定东京大学职员中供职满五年以上者，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自费出国留学一年至一年半。翌年 12 月，文部省进一步修订原有官费规则，将留学生生源在东京大学毕业生的基础上增加文部省直辖学校之专门科及师范科毕业生。⑧ 其后，留学生规则虽几经修订，生源资格也逐步确定为“文部省直辖学校之毕业生或教官”⑨，但主体内容已基本稳定下来，文部省对外派遣留学生制度得以常态化，派遣人数也固定在每年数十人左右。

不过，日本陆军省、外务省、海军省虽分别于 1873、1874、1883 年首次派遣学生来华留学，且其

---

① 关于日本对“中国”的相关历史称谓，为保留历史原貌，本文在引用史料记述时仅将“清国”“支那”等专用名词予以保留，其余做相应翻译，特此说明。

② 参见谭皓《近代日本军方首批留华学生考略》，《抗日战争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③ 坂本秀夫、山本廣三編『文部省の研究』、三一書房、1992 年、26—27 頁。

④ 据九鬼隆一所述，当时留学生有八成以上为“萨、长、土、肥”四藩所占，这与四民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相违。参见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 1 巻、教育資料調査会、1964 年、827 頁。

⑤ 石附実『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学史』、189、166—168、172 頁。

⑥ 渡辺實『近代日本海外留学生史』上、362 頁。

⑦ 渡辺實『近代日本海外留学生史』上、379—380 頁。

⑧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 2 巻、463 頁。

⑨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 3 巻、666 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中部分生源就来自文部省所辖学校(如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专业),但文部省在成立后的近 30 年间却一直未直接对华派遣过留学生。

究其原因,在宏观层面,文部省将派遣留学生作为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和培养人才的途径,把留学目的国主要限定在欧美,且早期以德国为主;留学专业上侧重理、化、工、农、医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面则以法学、哲学、史学、宗教及教育学为主。同期的中国正在通过洋务运动渐习西学,且也在向欧美等国派遣留学生。故而,文部省侧重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可谓东亚后发国家向西方先进国家"取经"的惯例,未派遣留学生来华也可理解。

在微观层面,日本当时高等教育中汉学等专业的课程设置及状态,也限制了文部省以培养教员为目的对华派遣留学生。东京大学是当时日本国内唯一大学,设理、法、文、医四学部①,其中文学部仅设史学、哲学、政治学科及和汉(即"日汉"——引者注)文学科。② 对与中国相关学科的教师需求相应有限,这限制了文部省为培养教员而对华派遣留学生。

总之,至 1899 年前日本文部省虽向欧美派遣共计 178 名留学生③,但并未派遣过任何人来华留学。

二、1899—1920 年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之展开

日本高等教育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为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契机。

首先,帝国大学及其"分科大学"的诞生。1886 年 3 月 2 日,文部省经敕令第 3 号颁布首个"帝国大学令",将东京大学改称帝国大学,规定"帝国大学由分科大学和大学院构成,其中大学院探究学术技艺之蕴奥,而分科大学教授学术技艺之理论及应用"(第 2 条)④,并将分科大学限定为法、医、工、文、理五科(第 10 条)。⑤ 所谓分科大学是与学部或学院相似的教学单位,至 1919 年改称学部。据此,原有文学部升格文科大学,学科设置也扩充为哲学科、和文学科、汉文学科及博言学科(后来的语言学科)四学科。虽然文科大学诸学科并未立即兴盛起来⑥,但文科大学的诞生及内部学科设置的扩充为汉学等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教学基本单位由"讲座制"取代"学科制",讲座教授职位相应增多。1893 年 8 月 11 日,日本政府颁布敕令第 82 号,修订原有"帝国大学令",规定各分科大学设置讲座,由教授负责教学(第 17 条)。⑦ 所谓讲座制是与学科制相对应的,以讲座作为教育、科研的基层组织单位和财政预算的基本单位,内设讲座教授(多为 1 名)、助教授及助手等岗位,由教授负责整个讲座的教学、科研及人事和财政。⑧ 同年 9 月 7 日,日本政府又颁布敕令第 93 号,确定各讲座的种类与数量。其中,文科大学开设国语学、国文学、国史(讲座数 4 个,以下括号内仅记数量),汉学、支那语学(3),

①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 1 巻、731 頁。

②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 1 巻、744 頁。

③ 参见辻直人『近代日本海外留学の目的変容』、234 頁。

④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 3 巻、245 頁。

⑤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 3 巻、246 頁。

⑥ 关于文科大学的情形,据 1887 年考入文科大学哲学科的服部宇之吉回忆,当时与其同时入学文科大学的只有 10 人,至 1890 年毕业时仅 5 人毕业。服部入学时二年级学生 6 人,三年级 2 人,此时文科大学全部在校生仅 18 人;而教师则有八九名日本人,4 名德国人及 1 名英国人。可知,其规模仍十分有限。参见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記念論文集:服部先生古稀祝賀』、冨山房、1936 年、8 頁。

⑦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 3 巻、473—474 頁。

⑧ 吴培群:《日本国立大学的讲座制及其发展》,《比较教育研究》2008 年第 12 期。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史学、地理学(2),哲学、哲学史(2)及其他讲座。① 可见,汉学等相关讲座数量增加,教授职位也相应增多。

再次,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一方面,为形成良性的学术竞争环境,日本政府于1897年6月22日颁布敕令第209号,计划创立京都帝国大学,并建立法、医、文及理工四科分科大学。② 另一方面,文部大臣桦山资纪于1899年7月5日向内阁提交《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对未来八年整体教育改革做一规划。其中在高等教育方面提出增加高校数量,如在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的基础上,在九州及东北增设帝国大学,在两校先期开设法、医、工三个分科大学,并用10余年时间发展其他分科大学。同时,为填补新增师资缺口,文部省计划增加留学生经费,增派留学生至每年150人。《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记述现今文部省留学生每年定员75人,且每年有20人左右归国,可以之充任学校教员。随着公立学校倍增,留学生定员也应翻倍,至1902年可增至150人。③ 同时,《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还附有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分配至各类学校的详细规划,参见表1。

表1 未来八年间留学生归国后分配计划表 单位:人

年度	定员	派遣	归国	东京帝国大学	京都帝国大学	九州帝国大学	东北帝国大学	高等学校	医学校	师范学校	商业学校	工业学校	农业学校	其他
1900	105	51	21	4	12				1		2	2		
1901	130	54	29	8	7				5	3(男)	3		2	1
1902	150	48	28	9	7					3(男)1(女)	2	3	1	2
1903	150	52	52	5	9	20			3	2(男)	2	8	3	
1904	150	54	54	4	8	10	20		2	1(男)	2	3	2	2
1905	150	48	48	4	6	12	10	2		2(男)	3	4	3	2
1906	150	52	52	4	6	10	12	2	3	3(男)	3	5	2	2
1907	150	54	54	4	6	6	10	8	5	2(男)	3	5	2	3
总计		413	338	42	61	58	52	12	19	17	20	30	15	12

说明:本表依据「文部省八年計画調査書」(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号:3-10-2-14)制成。

由上表可见文部省对倍增留学生以便日后填补新增高校师资缺口的强烈意愿和宏伟规划。《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随后虽未通过阁议,但后来大多得到实现④,对华派遣留学生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综上可见,正是在帝国大学设置分科大学并引入讲座制,以及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大背景下,文部省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授,开始对华派遣留学生。

1899年5月,文部省决定派遣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服部宇之吉"为研究汉学留学清国四年"(但其间为"攻究教学法及研究方法"转赴德国留学两年),至同年9月

①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3卷、475—479頁。

②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4卷、372—373頁。

③ 「文部省八年計画調査書」、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号:3-10-2-14。因时任文部大臣桦山资纪将《文部省八年计划调查书》的誊本交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参阅,所以外务省档案中也有保存。

④ 辻直人『近代日本海外留学の目的変容』、72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又任命服部为东京帝国大学专任助教授。服部于当月 17 日从东京出发,前往北京留学①,是为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随后,文部省在 1901 年 4 月 8 日制定的《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细则》补助额度条款(第 18 条)内,首次将"清国"作为与"欧美各国"并列的留学对象国,给予留华学生每年学费补助 1200 元,津贴 150 元。② 至此,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得以制度化。据笔者统计,在 1899—1920 年间,文部省先后派遣 11 人来华留学(详见表 2)。

表 2　文部省留华学生一览表(1899—1920 年)

序号	姓名	留学前所属学校、职称	来华留学时间	归国时间	计划留学时长	实际在华时长	研究学科
1	服部宇之吉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1899 年 9 月 17 日	1900 年 9 月	2 年	1 年	汉学、汉学教授法及研究法
2	狩野直喜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1900 年 4 月	1903 年 4 月	3 年	2 年	汉学、东洋哲学
3	伊东忠太	神宫技师兼内务技师、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助教授	1902 年 4 月 9 日	不详	3 年	不详	建筑学
4	冈本正文	东京外国语学校助教授	1903 年 8 月 1 日	1904 年 3 月 25 日	7 个月	7 个月	清语
5	宇野哲人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兼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1906 年 3 月 14 日	1908 年 3 月 14 日	2 年	2 年	支那学
6	桑原骘藏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1907 年 4 月 17 日	1909 年 4 月 17 日	2 年	2 年	东洋史
7	盐谷温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1909 年 9 月	1912 年 8 月 1 日	2 年	3 年	支那文学
8	高濑武次郎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1912 年 3 月 6 日	1915 年 3 月 6 日	3 年	3 年	支那哲学
9	铃木虎雄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	1916 年 4 月 6 日	1918 年 4 月 6 日	2 年	2 年	汉学
10	关野贞	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助教授	1918 年 3 月 17 日	1920 年 3 月 17 日	2 年	2 年	建筑史
11	石桥哲尔	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教授	1920 年 1 月 15 日	1921 年 1 月 15 日	1 年	1 年	支那语

说明:本表依据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历年编制的『元文部省外国留学生一覧』制成。该材料散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中。

① 参见「服部先生自叙」、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記念論文集:服部先生古稀祝賀』、12—13 頁。这也得到了文部省制作的海外留学生调查表的印证。参见文部省專門学務局編『元文部省外国留学生一覧』、1909 年 6 月 30 日調。

②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 4 卷、465 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关于服部宇之吉为何成为首位文部省留华学生,其中原委如下。服部于1887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同期考入史学科的有白鸟库吉),1890年毕业后活跃于政学两界,并在1897年11月至1898年9月间先后担任滨尾新、西园寺公望、外山正一三位文部大臣的秘书。外山正一离任时,服部一同辞职,并于1898年9月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后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正是此次由"政"返"学",为服部来华留学提供了契机。据其自述,此时外山正一和滨尾新两人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矢田部良吉商议,希望安排服部赴中国留学,以便日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这一初衷与日本高等教育变革的事实吻合。不过除此之外,外山的提议确有他图。甲午战后,清政府采纳张之洞建议,派遣10余名学生赴日本留学,日本文部省安排嘉纳治五郎负责教育。鉴于此,外山认为不仅日本可接收中国留学生求学,他本人亦可赴中国担任教习,只是当时时机不佳未能成行。外山便转而将此理想寄托于服部,推荐其赴中国留学,为日后在华教学奠定基础。①

服部这一记述正是学界误解其留学生身份性质的原因。不过,客观而言,这一初衷不过是外山个人的盘算,虽在后来如愿实现,但从日本政府当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文部省派遣服部来华留学主要仍是为东京帝国大学培养汉学讲座教授,所以服部确是名副其实的留学生。

三、1920年后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之变化

在对华派遣留学生约20年后,文部省对留学生派遣制度进行了改革。1920年9月15日,文部省通过敕令第393号颁布《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规程》②,废止原有留学生派遣制度,代之以派遣在外研究员。

比对此前颁布的多部《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可知此次新规并无太大变化,只将派遣人员之名义由"留学生"升级成"在外研究员",相应地在第1条中将生源资格由原有"文部省直辖学校毕业者或教官"缩小至"文部省直辖学校教官",并提高了相关补助金额。那么,文部省为何在1920年这一时间点,改派"留学生"为"在外研究员"呢?

据文部大臣中桥德五郎就制定新规向内阁总理大臣原敬提交的申请所记:"《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系明治三十四年制定,迩来虽不无修订,然依今日视之,仍有不少不适于当下实际状况之处。且预算已由第四十三回帝国议会通过。故有必要在学资、旅行准备费诸费资助方面修改规程,遂依照别纸敕令草案,具请阁议。"③即文部省在实际对外派遣留学生中,发现原有制度存在问题,有修订之必要;加之预算已经通过,于是便有充足资金用于改革,故而此时提请制定新规。

然而,这一表述仍无法明确回答前述疑问。其实,若以新规将生源资格由原有"文部省直辖学校毕业者或教官"缩小至"文部省直辖学校教官",与此前2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大发展之背景结合来看,可以推断至1920年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已基本补足了各新建大学的师资。换言之,将"文部省直辖学校毕业者或教官"派遣出国留学以补充师资的目的已近达成,派遣目的进而升级为专供各直辖学校的在职教师出国进修或研究,不再派遣直辖学校毕业生出国;同时因所派人员不再包含学

① 「服部先生自叙」、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記念論文集:服部先生古稀祝賀』、10—13頁。

② 教育史編纂会『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発達史』第7巻、774—776頁。

③ 「文部省在外研究員規程ヲ定ム」、国立公文書館、請求番号:本館-2A-011-00・類0133710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生,级别提升为“教师”,称谓也相应升格为“研究员”,才有了“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制度的出台。由此可进一步推论,派遣目的及人员身份的改变正是前述中桥德五郎申请中所述原规章不能适应的“当下实际状况”之所指。“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制度诞生,说明文部省通过派遣留学生培养高等教育师资的目标已基本达成,留学生派遣已上升至高等教育工作者常规性进修及研究层面,反映出日本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以培养师资的战略取得良好收效。

不过,具体到对华派遣留学生问题,由于文部省此前派遣来华者皆为东京帝国大学等高校的在职教师,所以称谓的更替并未带来实质影响;同时,随后派遣来华的“在外研究员”也与此前的“留学生”一样或跟随私人教师学习,或在学校注册听讲,并未改变“留学生”的身份。这也使文部省后期留华学生的派遣与前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并无太大变化。不过,由于缺乏档案资料,尚无法统计 1920—1945 年间来华留学的在外研究员的详细人数。但若从当时汉学及其他与中国相关讲座在日本大学教学及学术研究体系中不断式微,随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留学环境遭到破坏的角度来看,可以推测其在人数上甚或不及前期之多。这一局面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才逐步改善。

四、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之历史意义

以上梳理了近代以降至 1945 年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发展沿革。那么,在近代中日关系的摩擦与互动中,其到底有何历史意义? 我们或可从其与日本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制度,以及日本政府其他部门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比较中找到思路。

首先,文部省留华学生在起步时间和人数规模上远不及留学欧美者。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口号,全面向西方学习,旋即将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作为重要举措。其目的国主要集中在欧美,起初以德国居多,美国暂居次席,但自 1915 年起美国后来居上,成为日本人最重要的留学目的国。① 此外,英、法、瑞士、意大利等也是热门留学国。以文部省为例,据统计截至 1940 年底,其向各国派遣留学生共计 3180 人②,但来华者仅数十人,甚至不及总数的零头。加之,文部省在对欧美派遣留学生的近 30 年后才开始对华派遣留学生,所以,文部省留华学生与留学欧美者在起步时间和人数规模上差距悬殊,一目了然。

其次,文部省留华学生在受重视程度上亦不及留学欧美者。近代日本社会盛行“脱亚入欧”思潮,崇尚欧美,一流人才大多将欧美作为留学首选,这使留华学生生源处于劣势,而包括文部省在内的日本政府各部门并未利用政策杠杆予以调节。以留学生感受最为切身的补助为例,文部省(外务省及铁道省亦然)大体依照以下三类区域,由高到低划分补助:甲类是南北美洲;乙类是欧洲、非洲、大洋洲及除丙类以外的亚洲区域;而丙类才是中国及西伯利亚③,即留华学生的补助最低。这虽与中国在物价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地区存在差别有关,但金额的差别毕竟也是一种态度,间接反映重视程度的不同,不免给留华学生带来心理落差,甚至自觉低人一头。如 1919 年 7 月由外务省派往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委培的前田正胜,在表达对东亚同文书院办学模式不满时,就曾发出如此下去留华学生将较“赴其他国家留学者沦为更加低下之地位”④的感慨。这虽出自外务省留华学生之

① 辻直人『近代日本海外留学の目的変容』、50 頁。
② 辻直人『近代日本海外留学の目的変容』、376 頁。
③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8071566400、在外研究員規程に依る給与改正要綱案(国立公文書館)。
④ 「人事課普通受第三三二号」、『外務省留学生関係雑件・亜細亜各地』、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請求番号:6-1-7-6-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口,但或可视为日本留华学生的共同心声。

再次,即便在与其他部门对华派遣留学生的规模及制度比较中,文部省也处于劣势。据笔者统计,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最多的是外务省,其次是陆军省,而文部省甚至不及农商务省,排在末位。同时,就制度建设而言,文部省也并未像外务省等一样单独制定对华派遣留学生规程,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这虽与文部省派遣目的的局限性有关,但至少说明其始终未将对华派遣留学生作为重心。

然而,人数不多的文部省留华学生不仅并非"微不足道",而且在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独特地位。

相较于外务省培养胜任对华交涉的汉语翻译人才、军方培养翻译与军事侦察人员并举的派遣目的,文部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留华以培养与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师,本质上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倾向,客观上也取得了超越"工具性"的效果,不仅实现了教师培养,而且推动了日本近代汉学的发展,开启了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文部省留华学生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为战后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日本传统汉学研究虽然发达,但随着近代以降西学取代汉学占据核心地位,汉学研究逐渐沉寂。不过,随着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汉学等课程与讲座的设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空间与契机。在此背景下,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宇野哲人、桑原骘藏、盐谷温、高濑武次郎、铃木虎雄等一批具有良好汉学素养、接受新式汉学教育者来华留学。在华期间,他们不仅通过向中国学者求学提升研究能力,建立学术友谊,而且有如狩野直喜者更是通过与同期在华的欧洲汉学家交往切磋,重拾研究信心,坚定了继承业师岛田重礼考证学治学方法的决心。① 留学期满归国后,他们大多在高等学府执掌教席,成为日本近代汉学研究的先驱。

例如,服部宇之吉在继承井上哲次郎开创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官学体制学派"的基础上,发展出尊崇"孔子之教"的新儒家学派;狩野直喜关于中国古代思想与古代文学的系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更是获得王国维一代"儒宗"的美誉。② 同时,桑原骘藏对东洋史的研究、盐谷温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宇野哲人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也都取得了卓越成果。这些由文部省留华学生开创的研究业绩,时至今日仍堪称中日两国相关研究者的必读书目,成为联系两国学界的纽带。文部省留华学生也有别于其他部门派遣来华者,开启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

再如,1928 年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来华留学的仓石武四郎,留学期间不仅学习汉语,研习学问,还与中国知识分子交流,既提升了学术研究水平,也与中国知识界缔结了学术友谊,为日后推动日中友好埋下种子。在华期间,他曾直接受教于马裕藻、朱希祖、周启明、许守白、伦明、赵万里、吴承仕、孙人和、高阆仙、杨树达、范文澜、钱玄同、沈兼士、黄晦闻、杨钟羲、王孟嘉、于阔田、曾隐畊、徐森玉,并利用在北京及南下的机会,专程拜会了鲁迅、冼玉清、马隅卿、尹奭公、陈垣、陈寅恪、胡适、董大理、章太炎、黄侃等多位学者,给诸位学者留下深刻印象。1929 年 7 月 6 日,仓石拜访了杨树达,杨氏在"回忆录"中称赞仓石"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③ 仓石启程归国当日,许多学者前来送行,尹奭公、陈垣、赵万里还赠书留念,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学者对这位潜心向学的日本留华学生的肯定与敬重。④ 而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不但为其开阔视野,更建立起超越政治与时代的友

① 高田時雄「狩野直喜」、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 年、8—12 頁。

② 王国维《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收于《观堂集林》卷二十四)诗云"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君山为狩野直喜之号。参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1 页。

③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9 页。

④ 关于仓石武四郎在华留学生活,参见谭皓《仓石武四郎留华生活初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谊,在日后化作融化政治坚冰的暖流、推动中日友好的动力。1954 年夏,仓石受中国邀请,参加由 13 人组成的学术界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国庆节,率先打开中日学术交流局面。① 在日本战后初期反华的大环境下,他顶住压力,研究汉语、创办汉语教学机构中国语讲习会(后发展成为日中学院),并将校训定为"学好中国话,为日中友好架桥梁"②,成为推动中日友好的中坚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虽是培养教师,留学生在华期间的主要精力也用于学习及研究,但在日本不断推进侵华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很难超脱环境而独立存在,往往承担起日本政府分配的任务。如,仓石武四郎就于 1929 年七八月间受外务省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委托,在天津参与收购陶湘涉园藏书。经其校验,总数为 24614 册、3734 函,且印刷装订十分精良的陶氏藏书被日本买走,并瞒天过海地运回日本。③

综上可见,文部省在成立后至 19 世纪末的 30 余年间,将留学生派遣重心置于欧美,对华派遣留学生处于空白;随着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培养汉学等相关讲座教师,才从 1899 年起派遣留学生来华;而在制度运行近 20 年后,又因派遣目的及人员身份的改变而代之以在外研究员制度,但就对华派遣留学生而言并无本质变化,与前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文部省留华学生虽起步较晚且人数有限,受重视程度不及留学欧美者,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但在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他们在留学期间与中国学者及普通民众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也成为其在战后推动中日友好的内在动力。当然,部分留学生承担了日本政府的任务,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折射出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光与影。

〔作者谭皓,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王晓秋、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0 页。

② 参见日中学院倉石武四郎先生遺稿集編集委員会編『中国へかける橋』、亜紀書房、1977 年。

③ 高田時雄編『東方学資料叢刊第 17 册:陶湘叢書購入関連資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2010 年、4—9 頁。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